

白话尉繚子

吴如嵩
张秦洞
编著

时事出版社

白话尉繚子

选题策划：任超

责任编辑：王俊彦

封面设计：陈一清

ISBN7-80009-452-9/E·26 定价：14.50元

ISBN 7-80009-452-9



9 787800 094521 >

白话尉繚子

吴如嵩 张秦洞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话尉繚子/吴如嵩, 张秦洞译.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7

ISBN 7-80009-452-9

I. 白… II. ①吴… ②张… III. 尉繚子-译文 IV. E89
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859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 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昌平东旭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25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4.50 元

前言

《尉繚子》，战国时尉繚撰。从书中内容看，尉繚当是战国时代梁惠王时人。《尉繚子》一书现存5卷24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类”《尉繚》29篇，“兵形势家类”31篇，与今本《尉繚子》基本相符。唐初撰修《隋书·经籍志》著录《尉繚子》5卷，唐朝魏徵《群书治要》内收《尉繚子》4篇。北宋张载著《尉繚子注》1卷，已佚。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尉繚子》列入《武经七书》之一，作为考选武官的武学教科书。此后有宋朝施子美的《尉繚子讲义》，明朝刘寅《尉繚子直解》等著名注本出现。现存《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及明、清刊本50余种。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尉繚子》6篇，虽然残断严重，但它有力地证明了《尉繚子》确系战国时代的作品。

作为著名兵书的《尉繚子》，其军事思想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是“兵形势家”的特色，一是军事法规特色。

所谓“兵形势家”的特色，即《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指出的：“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尉繚子》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主要表现在详细论述了未战之前的对敌优势，将战之时的作战布势，既战之时的凌敌威势。就以最能体现兵形势家特色的速战速决，以“轻疾制敌”的论述而言，《尉繚子·攻权》中写道：“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从而攻之。敌将帅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从者，则我败之矣。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可以看出，这正是“雷动风举”，因形造势的生动写照。

关于军事法规，《尉繚子》无疑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精神和阶级意志。它十分重视军制的改革，对从中央（王权）到什伍，从将军到士兵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这些主张，对于奴隶主阶级的旧的军事体制来说，基本上是针锋相对的，是另起炉灶的。从将相的文武分职到军队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从理论上的“刑上究”、“赏下流”到平时和战时的具体要求，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尤为可贵的是，在现存的古兵书中，《尉繚子》是第一个在军制领域进行全面研究，深入探索的，是首屈一指的。

此外，《尉繚子》还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军事

见解，诸如“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诛暴乱，禁不义”、“气实则斗，气夺则走”以及“杀（裁减）士”的精兵主义思想等等，至今仍有其现实借鉴意义。

目 录

前言	(1)	重刑令第十三	(186)
天官第一	(1)	伍制令第十四	(196)
兵谈第二	(15)	分塞令第十五	(204)
制谈第三	(32)	束伍令第十六	(214)
战威第四	(51)	经卒令第十七	(224)
攻权第五	(69)	勒卒令第十八	(236)
守权第六	(88)	将令第十九	(249)
十二陵第七	(102)	踵军令第二十	(258)
武议第八	(113)	兵教上第二十一	(269)
将理第九	(136)	兵教下第二十二	(283)
原官第十	(146)	兵令上第二十三	(299)
治本第十一	(158)	兵令下第二十四	(310)
战权第十二	(173)		

天官第一

【原文】

梁惠王^①问尉繚子曰：“《黄帝·刑德》^②可以百胜，有之乎？”

【注释】：

①梁惠王：战国时期魏国国君，姬姓名莹，谥惠。在位期间（公元前370年——319年），因将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故称梁惠王。

②《黄帝·刑德》指在战国时流传的兵书，现已失传。疑指《汉书》中所载《黄帝》十六篇。

【原文】

尉繚子对曰：“刑以伐之^①，德以守之^②，非所谓天官^③、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邪^⑤？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⑥，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⑦。若城下^⑧池浅

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案《天官》曰^⑨：‘背水陈为绝纪^⑩，向阪陈为废军^⑪。’武王伐纣^⑫，背济水向山阪而陈^⑬，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⑭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陈哉^⑮！楚将公子心^⑯与齐人战，时有慧星出，柄在齐^⑰。柄所在胜，不可击^⑱。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⑲’。明日与齐战，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⑳’。谓之天时，人事而已^㉑。”

【注释】

①刑以伐之：刑，刑罚杀戮，战争攻伐。这句话的意思是：用武力攻伐敌人。

②德以守之：德，施行仁政，文德，政治。这句话的意思是：用政治治理国家。

③天官：天文星象，指日月星辰等天体的方位、分布、运行、变化。此处泛指瞻云、望日、察气、观星等与天象有关的占卜迷信活动。

④《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人事，人的活动，人的积极作用。这句话的意思是：《黄帝》所讲的，是注重人的积极作用。

⑤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邪：难道四个方向都没有所谓适当顺应的时辰和方位可以利用吗？

⑥城高池深：池，指护城河。全句指城墙高，护城河深。

⑦豪士一谋者也：守城将士同心合力。

⑧下：低矮。

⑨案《天官》曰：案，通“按”，按照。《天官》，书名。这句话的意思是：按照《天官》所说的。

⑩背水陈为绝纪：陈，同“阵”。绝纪，绝地，即死地。这句话的意思是：背靠着水布阵就是把部队置于死地。

⑪向阪陈为废军：阪(bǎn)，山坡。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向着山坡布阵就等于白送军队。

⑫武王伐纣：武王，即周武王。姬姓名发，公元前1027年率军东征，与商军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打败商军，灭掉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纣，商纣王。姓子名辛，商朝最后一个君主。

⑬背济水向山阪而陈：济水，亦称“洸水”，源出今河南济源县王屋山，下游多次变迁，古时直接入海，今流入黄河。这句话的意思是：背靠济水，面对山坡而布阵。

⑭亿：古时以十万为亿。纣王发兵拒周武王，一说七十万，一说十七万。

⑮岂纣不得《天官》之陈哉？：难道是纣王没有得到《天官》所说的布阵之利吗？

⑯公子心：楚公子，春秋时人，事迹不可考。

⑰柄在齐：柄，指彗星呈扫帚状时像柄把的部分。这句话的意思是：彗星的彗尾指向齐国的方向。

⑱柄在所胜，不可击：彗柄所指向的一方会胜利，不可以对它发起攻击。

⑲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用扫帚与人相斗，本应当把帚柄倒过来打才能获胜。

⑳先神先鬼，先稽我智：稽，考察，查问。这句话的意思是：重视尊崇鬼神，不如重视考查发挥自己的智慧。

㉑谓之天时，人事而已：所谓天时，不过是指人的作用罢了。

【译文】

梁惠王问尉繚子说：“《黄帝·刑德》这部兵法可以百战百胜，真有这回事吗？”

尉繚子回答说：“武力是用来攻伐敌人的，政治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并不是指天象、时日、阴阳向背之类的东西。何以见得呢？黄帝最注重的就是人的作用。比如现在有座城，从东西攻，攻不下来；从南北攻，也攻不下来。难道这四个方向都没有吉利的天象吗？之所以攻不下来，是因为城墙高、护城河深，武器装备齐全，物资粮食充足，将士同心协力。如果城墙低，护城河浅，防御力量薄弱，就可以攻下它了。由此看来，天象时日，不如人的作用。按《天官》书的说法：‘背水列阵等于置之死地，面山布阵等于白白送死’。但是，武王伐纣，就是背靠济水面向山坡摆开阵势，以二万二千五百人进攻纣王的十几万大军，灭掉了商朝。如按《天官》的说法，纣王岂不是应该获胜吗？又比如，楚国将领公子心同齐军作战，适逢彗星出现，彗柄在齐军一方。按照迷信的说法，彗柄所在的一方取胜，攻打齐军一定失利。公子心说：‘彗星哪有知觉？拿扫帚与人相斗，要把扫柄倒过去打才能取胜’。第二天同齐军交战，大败齐军。所以黄帝说：‘先去求神求鬼，不如先考察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所谓天时，不过是指人的作用罢了。”

【评析】

有史以来的战争，都是人类有组织有意识的暴力活动。从来没有过无人参加的战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具有自觉性的特殊物质，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一；人是社会的主人，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也是从事战争的主体和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是人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也是战争的主人，是人决定战争的目的、企图、规模、方式、时间，为战争准备了物质条件。战争的一切过程，一切方面，一切发展都离不开人的活动。人首先是一种物质的力量，人的物质力量在于其本身就是一种物质的实体。就个体的人来说，人的体质和体力是战斗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就群体的人来说，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就是一种物质力量上的优势。上述观点，在今天看来无可非议，大家都能理解。但在远古时期，人们的认识水平、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难以产生这样的认识。所以，《尉繚子》的首篇以“天官”为题是意味深远的。

“天官”的本意是指天文、天象。任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毕竟都要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制约，受到人们认识水平的影响。虽然先秦时期中国在天文学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对于天体情况的观测有比较丰富的文字记载，但对某些日月星辰的运行变化还无法作出科学、正确的解释。因此，仍对某些自然现象怀有某种神秘感和恐惧感。由于唯心论仍占统治地位，人们往往将天文星象与人间的某些事情附会起来，认为天人之间是相应相通的，日月星辰、人间冷暖，

上天在冥冥之中均有安排，一切均有宿命。而作为人们来说，应随应苍天的旨意，不可造次。当时，这种唯心主义的思想在人们心中仍占着统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尉繚子在首篇《天官》中，首先强调了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十分可贵的。他针对梁惠王“吾闻《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的疑问，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得出了“《黄帝》者，人事而已矣”的结论，提出了“天官时日，不若人事”，“先神先鬼，先稽我智”的重要论点。这里的所谓“人事”、“我智”，不仅仅是指人的精神力量，而是把人看作是一种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物质力量。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既同迷信的天官时日（观星察气、奇门遁甲之类）的唯心论划清了界限，又同单纯依靠客观物质条件（城高池深，兵器备具等）的机械唯物论划清了界限。

在《尉繚子》里，“智”是一种精神力量，是战争中官兵驾驭战争的能力，大体包括个人的军事素养、战斗作风、技术战术水平、军队内部关系、人与武器的和谐程度等。这些因素都是“人事”因素，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战争不是个人之间的争斗，而是有组织的政治集团之间的一种政治行为。战争中的人，虽然也包括个人的作用，但又绝不仅仅是指个人的作用，而主要是指军队的整体，指整个阶级、国家、民族、政治集团乃至从事战争的整个人群。因此，战争中的人，是战争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辩证统一体，是一般社会关系和特殊暴力关系的辩证统一体，是战争的个体与整体的辩证统一体。

1938年，中国人民迎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当

时，徐州失守，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侵华日军在占领了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大片中国领土后，挟战略进攻之势，集中了9个师团又3个旅团的陆、海、空部队共约35万人直逼中原腹地武汉，战争形势异常严峻。眼看着日寇的长驱直入，中国军队的一再失利，在一些人当中引起了一股恐日症，“中国的武器不如人”、“抗战必亡”、“再战必亡”的论调不绝于耳。毛泽东在对中日双方人力物力两方面的因素进行了深刻分析之后，针锋相对地指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我们认为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人的努力增强的。”

毛泽东在阐述抗日战争中人的作用时，就不仅指军队的成员，而且包括整个国家及国际上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他说：“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毛泽东还深刻阐明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且还高度概括地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所以，“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历史事实证明，军力和经济力处于劣势的中国，终于战胜了拥有较强军力和经济力的日本。

当蒋介石凭着七倍于中共军队的兵力和比较精良的美械

装备，并依仗为其控制的全国四分之三的国土，气势汹汹地发动全国内战的时候，毛泽东就把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优势，看成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他十分藐视地把它比作天空中一时出现的一片乌云，“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进行战争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军队，军队是武装了的人按一定的编组方式组成的。没有人，没有军人，没有军人按一定的模式组成军队，战争就没有主体，也就不成其为战争。战争不但是双方经济力量、武器和技术装备方面的较量，同时也是创造着经济力量的人和掌握着武器、技术装备的人的较量。从事战争的人，计划准备着战争，根据情况的变化能动地指挥着战争，操纵着武器进行战争，因而决定战争的胜负。毛泽东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物”，是指武器。其实，人也是物质的，只不过是会思维的特殊物质。人的肉体包括大脑和四肢，都是物质的客观存在，没有肉体的存在，也就没有具体的人。但人可以行动，区别于不能行动的物；人又可以思维，区别于可以行动但不能思维的动物。人的这种思维的能动的特性，使人成为其他物质的主人。人能创造一些物质，改变一些物质，控制一些物质，毁灭一些物质。在战争中，一切武器装备都要通过人的使用才能发挥作用。精良的武器，掌握在毫无斗志的士兵手里，是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而粗劣的武器，掌握在觉悟很高的士兵手里，它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超过前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初创时期，就是凭着革命的觉悟，拿着十分简陋的武器，如梭标、长矛、大刀、菜刀等起来暴动，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了国

内外的强大敌人。这充分说明了人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

军队的质量，最基本的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武器的因素，二是人的因素。武器装备的质量，是军队质量的物质因素。武器装备精良，战斗能量储量大，就具备了胜利的物质基础。人员的素质，既是物质因素又是精神因素。人员的素质高，可使能量充分释放出来，使可能的胜利成为现实的胜利。人的素质低，不能将能量充分释放出来，有可能失去可能的胜利，或使可能的胜利转化为失败的现实。

战争中人的作用，虽然主要是指整体的力量，但是，这种整体的力量，又绝不是许多个人力量的简单相加。当由许多个人构成整体时，就较之未构成整体的同样数量的个人具有质的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说，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会产生新的力量，这种合力是个人力量的综合放大。他还举例阐述道：“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并且，因构成整体的组织形式或方式不同，其所形成力量的质量也不同，例如拿破仑在描述当时骑术不精但很有纪律、善于组织的法国骑兵，与善于单个格斗但无纪律、不善组织的马木留克兵战争时曾认为：“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

当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了两颗原子弹以后，世界上许多人得了“恐原子弹病”，毛泽东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子弹也是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